责任编辑：张丹丹 E-mail:zhangdandan7315@163.com 电话：010-62807315
758103815@qq.com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文化发展路径

□王克修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新丝路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全球高度关注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一带一路”，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上升期，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新丝路战略构想，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沿线各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进文化先行，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无论是古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都源自于不同民族的人们对文化交流交融的向往与参与，更需要依托于促进文化艺术取长补短、商贸活动热络开展、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发展。古丝绸之路既是一条通商互信之路、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古代中国许多物质文化和发明创造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后，对促进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近代西方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知识，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这两条通道所展现的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心态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出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充分发掘沿线国家深厚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使沿线各国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

首先，善用恰当话语体系，阐释倡议内涵。“一带一路”建设的障碍和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来自沿线有关国家的疑虑。减少疑虑、建立互信至关重要。突出“一带一路”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强调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经济上平等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经济扩张”，也不是“中国一家独大”，更不是谋求海洋霸权、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势力范围。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其性质是和平的。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强调中国不搞单边主义，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避免使用“西进”“崛起”等带有单边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虑。

其次，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推动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稳定和牢固的官方文化交流平台；与上合组织、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多个组织成员国及中东欧地区建立了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联委会机制，这是我们今后可以进一步借重的重要基础。未来，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制定政府文化交流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落实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视情况在相关计划中纳入共建“丝绸之路”的内容，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同时，要注意发挥上合组织、东盟“10+1”、中阿合作论坛等现有机制的作用，丰富现有机制框架下的人文合作内容。

再次，积极发挥市场主体性作用，推动文化企业“走出去”。文化企业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去参与、互动。一是做好“走出去”的准备，必须事先对国际商务的各种通行惯例和规则了然于胸，对目标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局状况、法律规章、风俗人情等充分熟悉，同时，为提高属地化水平，有必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的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环境意识等特点特色，这方面的了解越透彻，越有利于在当地长期扎根发展。二是文化企业“走出去”在产业层次、科技含量、供应链管理、品牌打造等方面还亟待提升。企业必须适应当前在国际价值链中位置的上升势头，顺势而为地提高各方面的能力与层次，并最终形成综合性的良性互动。总之，对于众多有意向并有实力“走出去”的文化企业来说，独善其身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企业怎样收到这种信号并积极落实到市场活动中去。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

耀邦同志指导文史教研室编教材

□陆 钦

1977年3月至12月，胡耀邦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很关心文史教研工作。有一次，我们应约到他的办公室去座谈，地点在甲级楼；另一次，他到文史教研室来调研，地点在16号楼二层会议室。两次见面，他谈了许多关于如何读书、如何搞好教学科研的意见。事过几十年，现在回忆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我们要把多年来各种运动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多读书，读好书，一天读多少字，一个月读多少字，一年读多少字，脑子里多装知识。二、读什么？要多读经典，古今中外的名著就是经典，要列出一个书目，一部一部地读下去。三、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要学以致用，要为我们国家未来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四、结合文史教学定出科研计划，从基础的东西做起，一步一步搞出成果来。五、文史教学研究是中央党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古代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借鉴。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耀邦同志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和大家打成一片，特自然，特亲切，特热情，特真诚，特直爽，真好像亲人在和我们拉家常，但很深刻的道理就在这里面，让人回味无穷。

在耀邦同志热切期盼和关怀指导下，文史教研室编写了六本书，总计222万字。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态度》（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革命文风》（中央党校教材）、《中国古代政治人物传选注》（上、中、下三册，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古文选注》（中央党校教材）。

《论科学态度》《论革命文风》这两本书编起来占用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耀邦同志一再强调，要拨乱反正，要正本清源，我们很有必要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在科学态度、革命文风上的经典论述。教研室几次开会反复研究，最后还是决定：要通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来收集有关的资料，这是何等浩繁的工程。《马恩全集》50卷3200万字，《列宁全集》38卷1600万字，《斯大林全集》13卷300万字，总共5100万字。一共十几个人，分工通读，要细读、要精读，从这几千万字的经典著作中寻找以上两方面的论述，取得大量资料后，归纳若干问题，回过头来再审视选文段落，是否恰当。在编书过程中，精神上受到一次洗礼，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受益匪浅。经过反复讨论，再三斟酌，最后成书出版。我还记得书稿《论科学态度》征求意见时，吴江同志的反映是三个字：“看不懂”。当时教研室主任安庆山同志在会上传达这个信息时，他的面孔显得无可奈何，一次又一次用右手指梳理他花白的头发。可能是感到，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编出的东西，看过后连句安慰的话语都没有，只有冷冰冰的“看不懂”三个字。后来，我仔细地思索，这“看不懂”三个字还真的很深刻，很实在。为什么？它起码有三层意思：一、孤立地阅读一段话语，不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针对性，的确不免雾里看花，摸不到头脑；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特点，不经过深入地解析，真的不知所云；三、任何文章的选段，都不容易摆脱“断章取义”，有时引起不同的理解在所难免。例如，当年两位大哲学家在《人民日报》上展开激烈辩论，不就是由于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思维存在的同一性的不同理解引发的吗？看来，配合“解析”还是非常必要的，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中国古代政治人物传选注》，共三册。出版的时间比较晚一点，它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选编了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103位政治人物的传记，加以详尽注释。读者通过阅读他们的生平事迹，可以观察他们的人生得失、精神风貌，可以总结出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编著者为：陈作梁、刘仲亭、萧少秋。刘君呕心沥血，编著此书，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古文选注》也是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编著的。选文内容尽量考虑到党校学员的特点。既有总结治国经验教训的内容，也有陶冶性情品德修养的篇章，多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每篇文章都有简评和注释。编著者为：刘景录、鲁金波、戴钦祥、张傲卉、陆钦、李亚麟。全书最后由陆钦统稿。后来编写的50多万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述要》可以说是这本书的姊妹篇。

以上六本书，为后来的党校文史教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段编书的经历，起码有三点收获：一、文史教研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我们要经历艰苦的磨练过程，这样心里才踏实。要十分珍惜现在的大好环境，生命非常宝贵。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二、学无止境，时代在前进，我们在业务上应当不断提高才有可能赶上时代的步伐。三人行，必有我师，但真理更可贵。亚里士多德曰：“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三、育人先育己，与时俱进，要站得高、看得远，才能更上一层楼。巴尔扎克曰：“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才是一个力量无穷的人。”在步入历史新时期之后，中央党校文史教研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和耀邦同志的关怀密切相关。在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笔者仅以这篇短文来表达发自内心的缅怀之情。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为官贵在“知止”

□赵迎辉

《老子·四十四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孙子兵法》云：“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增广贤文》有言：“知止常止，终身不耻。”知止，既是道家用来调节处理“身”与“心”关系的思想主张，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独特、极为可贵的价值取向。“知止”的思想对于我们做人、做事、为官，都极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清朝名臣曾国藩曾经说过：“人生之善止，可防危境出现，不因功名而贪欲，不因感极而求妄。”正是由于深谙“知止”之道，曾国藩才能在乱世当中屹立不倒，最终实现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对于今天的为官者而言，是否懂得“知止”，是否善于“知止”，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荣辱成败和国家的命运前途。

“知止”，就是要抵诱惑，禁私欲，守住做人、处事、用权的底线，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知止”，就是要知进退、明得失，不铤而走险，事事适可而止；不贪得无厌，时时留有余地。常抱平常之心，常怀戒惧之意，做到进退有节、行止得当。

现实生活当中，无论身居何位、所为何事，潜在的诱惑无处不在，名利的追逐没有止境。为官者由于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往往面临着更多的诱惑和更大的考验。只有懂得“知止”，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知之明，有谦卑之心，才会在名利问题上多一些淡定，对进退得失处之泰然。才会珍惜今天的拥有，守住到手的幸福，并以感恩之心创造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有为人生。正如《大学》中所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知止”不同于知足。知足是对“已经得到满足后”的精神反刍，“知止”却是“获取过程中”的主动放弃。知足是不妄不贪，“知止”是克己不随。知足不易，“知止”更难。为官者如何做到知止？

积累“以止为得”的人生智慧。隋朝大儒王道在《止学》中云：“大智知止，小智惟谋”。意思是说拥有大智慧的人知道适可而止，而只有小聪明的人却只知不停地谋划。纵观近几年来落马的贪官，正是由于没有参透“大智知止，小智惟谋”的道理，为追求权势不择手段，为聚敛钱财无所顾忌，自以为机关算尽、万事尽在掌握，殊不知早已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老子·四十四章》指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为官者只有明白“知足者富、知止者久”的道理，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化，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才能做到终身不险、止而有得。

培养善于“知止”的政治定力。政治定力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党性修养、高度的制度自信和高尚的政治品格的有机统一。具有坚定持久的政治定力，这是能够“知止”、善于“知止”的先决条件。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多元思想观念相互激荡，挑战着为官者的价值观念；各种物质诱惑无处不在，冲击着为官者的自律防线。面对诱惑和挑战，为官者不仅要有懂得“知止”的人生智慧，更要有善于“知止”的政治定力。许多落马的贪官正是由于缺乏政治定力，动摇了理想信念，弱化了党性修养，面对物质诱惑和风险考验，思想麻痹、心理失衡，最终陷入泥潭、酿成大错。因此，为官者要注重培养自己的政治定力，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通过提高理论素养提升政治定力；要努力锤炼党性修养，通过强化宗旨意识增强政治定力；要在社会实践和具体工作中检验和磨练政治定力。做到面对声色犬马、金钱名利等诱惑不为所动，面对错误思潮、错误观念等侵袭不被裹挟，面对贪污腐败、用人不公等干扰坚决抵制。

有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古人云：“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为官者只有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始终把握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反观落马的贪官，正是由于对党纪国法无所畏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该收手时不收手，以致在违法乱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落得身陷囹圄、悔恨终生的结局。古人云：“畏法度者最快活”。一个人只有遵守法律的约束，才能从法律中获得自由。为官者必须牢记法律的红线不可触碰，道德的底线不可逾越，自觉遵法守纪、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权力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人生而有欲”，但贵在“知止”。司马迁曾经说过：“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唯有以“知止”为始，方能以“有得”为终。唯有领悟到“知止”的真谛，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份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念法纪之威，方能避免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业有所成。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

随 笔

泰山风范 道德文章

——怀念恩师罗国杰先生



师生合影

□任俊华

早晨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葛晨虹师姐发来的短信，恩师罗国杰先生于2015年3月9日7点22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惊呆了。十余年来，恩师罗国杰先生前后患过6次大病，但他都战胜了病魔，并依然笔耕不辍，为新中国伦理学事业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我总期盼着这次他也能像以前一样，却不料天不从人愿……

二十年敬仰终结师生缘

初闻恩师大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后来，在湖南零陵地委党校培训时，我有幸阅读了恩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书，知道罗老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从那时起，我就与伦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受恩师影响，我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就定为“党政干部道德监督新论”。后来这篇文章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更坚定了我对伦理学的专业志趣。

后来几经周折，我再次回到湖南师范大学攻读伦理学博士。有着十余年期刊主编经验的我，受命参与《伦理学研究》的创刊工作。我与唐凯麟老师北上征求时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罗国杰先生的意见。罗老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得知卢德之博士愿意出钱、出力支持《伦理学研究》的创刊和出版，罗老很高兴，他为唐老师能有这样支持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弟子而高兴，说伦理学学科发展尤其需要卢德之博士这样的人来支持，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为了方便我们创刊，罗老还当场拍板把我们要筹办的刊物定为中国伦理学会会刊。

在《伦理学研究》创办期间，我多次致电罗老，征求他对于《伦理学研究》办刊主旨、栏目设置、文章编选等方面的意见，罗老都细致地进行了解答。伦理学界所有学人都与罗老有着或近或远的师生关系，罗老不仅用这层关系致电他们，让他们将好的稿件留给《伦理学研究》，还亲自撰写稿件发在了《伦理学研究》试刊号。《伦理学研究》现在已经是国家级核心期刊，这里面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罗老的心血。

更让我欣喜的是，办刊期间与罗老的沟通和交流，让罗老深入了解了我的为人和学识。在一次通电话时，他告诉我欢迎我博士毕业后到人大读他的博士后，让我与他的大弟子，时任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的焦国成教授联系。在焦老师的帮助下，我20余年的敬仰，终于有了结果。2004年9月，我来到了人民大学，追随罗老，从事博士后研究。

育人孜孜不倦初心不改

博士后进站不久，我就参与了罗老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的项目中。恩师与我、吴俊师妹、清文师弟、瑾菁师妹、郁卉师妹一起多次开会，研讨课题的提纲、章节的逻辑、内容的编选等等。虽然，那时恩师的身体状况已不太好，但每次都坚持与我们讨论，为课题的研究和我们的成长倾注了无数的心血。

在我的博士后研究方面，罗老也多次耳提面命、悉心指导。在商定我的博士后报告的选题时，罗老指出，你在党校系统工作多年，又有着十余年党刊办刊经验，应该更多地关注执政党的道德建设问题，并建议我以此作为博士后报告的题目。在博士后报告的写作过程中，罗老多次为我讲述了他在同济大学学习期间，党对他的教育和培养，讲述了他是如何从一个爱国进步青年成长为我党的地下党员的，更讲述了他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设的关注和思考，等等。每一句话都饱含着他对党的热爱与忠诚。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深深地感染着我。

罗老不仅关注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关心我们的生活。博士期间的一场大病，使我的博士后研究面临了身体的病痛和经济的窘迫之双重困扰。是罗老不断鼓励我、支持我坚持完成博士后的研究工作。罗老还用小楷为我抄录了方志敏烈士《清贫》中的一段话激励我。“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句话不仅伴随我度过了那段难捱的时光，而且已经成为我的座右铭，装裱好放在了我的案头，时刻让我奋进图强。

在我的工作问题上，罗老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希望我能把博士后报告的内容付诸实践，把执政党道德建设方面的想法应用到党的干部教育中去。他说，道德建设就是要身体力行。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来到了中央党校哲学部，并几经周折，来到了伦理学教研室，担任副主任，按恩师的要求，继续在执政党道德建设和伦理学学科发展方面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得知恩师罗国杰先生不幸逝世，各界人士纷纷表达了悼唁之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也对罗老的逝世表示了沉痛哀悼，并向家属表示了慰问。中央党校哲学部嘱我代拟了挽联：“对党耿耿忠诚崇扬马列倡导集体主义新德性论铸就泰山风范、执教孜孜不倦融会中西奠基中国现代伦理事业谱写至善文章！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敬挽罗国杰先生”。

以此短文，缅怀我的恩师。罗国杰先生千古！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哲学部）



甘肃省委党校春景

校园风光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